

## 东欧三国与我国课外补习的比较研究

杨洪亮

**摘要：** 通过比较得出：东欧三国和我国的课外补习的兴起原因在文化和经济维度上存有差异，但全球教育文化的推动、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学校教育制度隐含逻辑的转变是二者共同的表征；二者阶层和城乡差异说明课外补习具有社会复制和分层功能，急需政府改进社会福利；二者的规模存在、相关信息的非官方性和政策的放任性呼吁政府改革现行政策；东欧三国许多大学教师从事课外补习警示我国政府关注大学教师因自主招生考试而从事课外补习滋生的腐败。

**关键词：** 课外补习；东欧三国

**作者简介：** 杨洪亮 /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比较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南充 637009）

近年来，补习热潮向全球蔓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随处可见各种形式的课外补习，其不但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行业、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甚至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sup>[1]</sup> 它不但对主流学校教育体系形成巨大挑战，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因此，课外补习已成为各国迫切需要关注的课题。受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和各项教育指标国际排名的影响，各国课外补习的发展走向趋同，这为我们相互比较借鉴提供了可能。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多数相关研究仅基于本土研究，较少借鉴它国经验。因此，了解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课外补习的现状、分析其成因和影响、借鉴其治理机制将为我国的教育规划者和研究者提供开阔的国际视野。阿尔巴尼亚、格鲁尼亚、立陶宛这三个东欧国家与我国同属发展中国家，教育体制深受前苏联的影响，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相同，经济都经历了计划向市场的转轨，且课外补习的兴起与之密切相关（转轨前课外补习要么不存在要么规模很小，但转轨后发展迅猛）。因此东欧三国与我国课外补习的外在表征和内在兴起原因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拟通过比较东欧三国和我国的课外补习兴起原因、形式、内容、规模、地域分布、供需方和政策，以期为我国消减课外补习的负面效应带来启示与借鉴。

### 一、兴起原因比较

课外补习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复杂教育现象，既需要从教育系统内部寻找原因，又需要联系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进行深度思考。因此，我们将从教育、经济、文化三个维度比较课外补习的兴起原因。

#### （一）经济维度

从经济维度来探讨课外补习兴起的原因，需要考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宏观方面来说，课外补习兴起和发展与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三国和我国的经济由计划向市场转轨有关。虽然二者在转轨过程中实施的方式和后果不同，但都在客观上促进了课外补习的发展。东欧三国实施激进式“休克疗法”使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严重衰退，到2000年才恢复元气。与之相应，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被迫紧缩。以格鲁尼亚为例，政府的教育支出从1991年占GDP的7%下滑到1994年的1%，尽管从1995年起有所改善，但到1998年仍然只占2.4%，远低于国际水平。<sup>[2]</sup> 一方面，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使主流学校教育质量急剧下降，家长出于子女未来的考虑，不得不将子女送往补习学校就读。另一方面，教育公共资助的巨减使政府无力足额支付教师工资，许多教师的工资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补贴家用他们不得不从事课外补习。以阿尔巴尼亚为例，2000年该国教师每月

的平均工资为20-25美元,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70%。<sup>[3]</sup>所以,课外补习在这三国的兴起体现为在经济转轨出现困境后、应对面临崩溃的教师工资足额支付结构和主流学校教育质量下降的一种反应。与东欧三国不同,我国经济转轨采取的渐进方式使经济高速增长、居民人均收入大幅提高。这不但使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实施免费义务教育,而且使家庭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课外补习投资。现有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了中小學生家庭收入水平和课外补习投入成正相关。<sup>[4]</sup>

从微观方面来说,课外补习活动在东欧三国和我国兴起,很大程度是由于需求者可以通过参与补习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所致。东欧三国与我国的人均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社会保障制度较为落后、个人的生存难度相对较大,因此人们生活会因接受教育程度或质量的不同而呈现较大的差异。所以,较好的途径就是增加对孩子教育的投资,以提高其学业成绩,以便将来分配社会、经济资源时处于有利的境地。如课外补习能像被期望的那样增进学业成绩,家长就必然会让学生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以获得更高的学历,从而获得更多的个人收益。

## (二) 教育维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化,课外补习已走出主流教育系统的影子,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与教育制度联系密切。据贝磊(Bray)的观点,在那些可以通过补习投资就可以轻松地提高学业成绩的教育系统里,补习现象更为明显。在以教师为中心而非儿童为中心的体系里,在不能容忍后进生存在的情形中,人们对补习有更大的需求。<sup>[5]</sup>据此而言,我国目前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无疑为课外补习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土壤。考试(尤其是大学入学考试)具有的教育和社会选拔功能,决定着一个人未来的人生,给学生和家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据调查,我国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原因中,“升学压力”位居榜首。<sup>[6]</sup>此外,在当前市场经济制度下,“重点学校”和“特色办学”的学校教育制度对课外补习的兴起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为地设置重点学校或特色学校在导致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同时也使非重

点学校里面的不合格教师不能正常退出,外面的优秀人才难以及时进入,教学质量得不到提高。为了让孩子进入重点学校,很多家庭只好送孩子去课外补习。由此可见,从教育维度来看,课外补习的兴起实际上是家长对我国“独木桥”升学政策、“重点学校”和“特色办学”学校教育体制以及社会竞争加剧的一个自然反应或回应。<sup>[7]</sup>反观东欧三国,我们同样发现,课外补习的兴起与这些国家教育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东欧三国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原因中,“升学压力”同样位居第一。调查显示:在东欧三国中,57%的补习者坦言参加课外补习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大学入学考试,84%的补习者相信课外补习可以增加上大学的机会。<sup>[8]</sup>此外,立陶宛实施的诸如我国“重点学校”的“名校制度”,使大学入学的门槛大大提高,学生为了步入名校,不得不参加课外补习以提高学业成绩。因此课外补习在东欧三国的兴起同样表现为对升学压力、“重点学校”和“名校”学校教育体制以及社会竞争加剧的自然回应。

除此之外,“全民教育”运动、高等教育全球扩张的推动和教育制度隐含逻辑的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课外补习的发展。在全民教育运动的影响下,各国聚焦于初等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具有仿效和补充功能的课外补习恰好能满足人们的这种自然需求,逐渐被民众普遍接受。此外,受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全球扩张的影响,人们对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急剧增加,著名大学入学考试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为了步入名校,许多学生不得不参加课外补习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最后,学校教育制度隐含逻辑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课外补习在东欧三国和我国的发展。以前学校教育制度与国家现代化密切相关,如今这一逻辑已被后现代社会强调普及的、具有强度和活力的新的教育逻辑所取代。<sup>[9]</sup>

## (三) 文化维度

研究一种教育,必须研究它的文化基础。只有研究影响教育的文化因素,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教育与文化传统及其变迁之间相互作用和制约的内在规律。我国文化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对教育

的影响极为显著，表现为重文化教育，将孩子考上名牌大学看作是将来找好工作、取得优势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在“望子成龙”和“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的作用下，家长之间互相攀比，课外补习的兴起也就在所难免了。相对而言，课外补习在东欧三国的兴起，虽与这三国重教育和不排斥课外补习的传统文化有关，但更多的还是由政治和经济转轨所带来的文化变迁所致。随着经济和政治的转轨，东欧三国过去视阶级斗争为社会进步最为关键的因素的主导文化发生了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教育越来越被人们看作“实现社会进步的一种手段”。<sup>[10]</sup>在这一文化下，很多家庭将课外补习作为一个有效的机制去适应市场经济和新民主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和文化现实。

## 二、课外补习内容、形式比较

在补习科目上，东欧三国学生接受辅导的内容可能根据所在教育系统中优先科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总的来说，数学、科学以及外语（主要是英语）仍然是最为普遍的补习科目。以数学为例，阿尔巴尼亚、格鲁尼亚、立陶宛参加数学补习的学生就分别占了总数的87.6%，59.6%和44.5%。<sup>[11]</sup>同样，我国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科目也主要是数学、外语（主要是英语）等一些大学入学考试要考的学科。究其原因，学好这些学科对学生以后的发展可能更为有用。

从补习形式来看，东欧三国与我国一样，既有传统的“一对一”及“一对多”的面授方式，也有利用电话、电子邮件以及在线网络进行补习的新兴方式。但相比较而言，这三国采取“一对一”或“一对二、一对三”这种补习形式的比例比我国高。数据统计显示，阿尔巴尼亚、格鲁尼亚、立陶宛接受一对一或小规模（2-3）课外补习的分别占了受调查者的54.1%，70.7%和81.4%。<sup>[12]</sup>

## 三、课外补习规模及地域分布比较

### （一）规模比较

学生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课外补习的规模。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73.8%的小学生、65.6%的中学生、53.5%的高中生参加了课外补习。<sup>[13]</sup>而一项在2002-2003学年针对大一新生的调查显示，东欧

三国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的比例分别是：62%（立陶宛）、48.9%（格鲁尼亚）和60.5%（立陶宛）。<sup>[14]</sup>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和这三国比例不同，但无可争议的是，课外补习已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教育产业。它的出现，既是社会和市场共同选择的结果，也是主流学校教育系统无法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的反映。

### （二）地域分布比较

从地域分布来看，东欧三国和我国的课外补习在城乡间均呈不均衡状态。陈全功等通过对湖北省大城市、小县城、乡村三类梯次变化地区的学生接受课外补习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城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比例的差距高达70%。<sup>[15]</sup>曾满超等基于甘肃、湖南和江苏3省的调查也发现初中生课外补习城乡差异明显。<sup>[16]</sup>东欧三国情况也比较相似，根据OSI（2006）的研究，立陶宛城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相差17%。<sup>[17]</sup>格鲁尼亚、阿尔巴尼亚城乡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差距也分别达到了23%和35%。<sup>[18]</sup>相关研究表明，之所以出现这一城乡课外补习规模的差异，是与城市生活的竞争性、家长的高层次性以及较高经济条件有关。

## 四、课外补习供给方和需求方比较

从供给方来看，东欧三国中，除中小学在职教师、退休教师和大学生外，大学教师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资料显示，在格鲁吉亚，多达40%的学生在大学教师那里接受课外补习，即便在比例最小的阿尔巴尼亚，也达到了11.7%。<sup>[19]</sup>这可能与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实施的时间和教育公共资助减少有关。以格鲁吉亚为例，该国2004年才实行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大学入学考试，而在这之前，都是由各个大学自主招生，很多高等教育机构的老师甚至出题老师便利用各这一便利进行课外补习。此外，高等教育公共资助的减少、大学教师收入的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高校教师从事课外补习。与这三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课外补习供给方主要还是以中小学教师为主，鲜见大学教师从事课外补习。2008年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哈尔滨等六大城市的一项电话调查显示，约六成的在职中学教师从事课外补习活动。<sup>[20]</sup>从需求方来说，东欧三国与我国较为一致。除

了学习困难的学生和想通过补习考上理想大学的学生参加补习之外,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对课外补习的需求也很明显。调查显示,在阿尔巴尼亚,来自较高教育程度家庭的子女超过60%接受了补习,而来自较低教育程度家庭的子女只有19.2%接受了补习;<sup>[21]</sup>同样在我国,调查也显示,父母亲受教育程度高和富人家的子女更容易接受课外补习。<sup>[22]</sup>

### 五、课外补习应对政策比较

对于课外补习,因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的不同,各国政府政策也有所不同。经考察,东欧三国政府采取故意的放任政策,即有关政策制定者考虑过这一问题,但出于财力的考量或因为这一领域有许多财政和政策的陷阱,主动决定采用不干预的政策。如前所述,一方面,这三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足额支付教师的工资,不得不对课外补习活动网开一面,以使教师通过补习活动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课外补习具有的补充功能与家庭、学生个人需求之间存在适切性,有存在的土壤。因此,即使政府出台一些措施,如果不能提高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效改进主流学校教育质量,也不一定会得到公众的支持,反而可能会流于失败并引起社会紧张,因此这三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放任政策。

与三国有所不同,我国目前对课外补习基本上采取混合型政策,即对非主流学校的教师从事课外补习活动持允许态度,对主流学校系统的在职教师从事家教基本持禁止态度。但在有些地区,对在职教师从事家教也不是完全禁止。以南京、金华等地为代表,这些地区对此“有条件开禁”;以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方为代表,这些地区对此“不提倡但也不成文禁止”。我国之所以采取混合型政策,主要的原因如下:一是课外补习的产生是市场和社会共同选择的结果。在当前倡导市场和自由的经济体系下,课外补习在中国有存在的土壤,允许非在职教师从事课外补习既可以弥补主流学校教育系统的不足,满足学生的多样性需求,还可以创造就业。二是在职教师有偿家教败坏了教师声誉、损害了教育形象,必须对此整治。相比东欧三

国采取的故意放任政策,我国采取的混乱和模糊的混合型政策其实质也是放任,只不过是符合条件的放任而已。

### 六、基本结论和思考

课外补习在东欧三国和我国的兴起原因虽在文化和经济维度存有差异,但全球教育文化的推动、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学校教育制度隐含逻辑的转变是二者共同的表征。

课外补习在东欧三国和我国同呈阶层和城乡差异说明课外补习具有社会复制和分层两大负面效应。为了减少这种负面影响,政府除了让公共教育资源更多地向弱势阶层和群体倾斜外,还应为乡村和低收入家庭提供课外补偿教育服务,以此促进社会公平。更重要的是大力发展经济,切实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

通过规模的比较,我们发现无论东欧三国还是我国,课外补习已演变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但目前课外补习信息的非官方性和政策实质的放任性似乎表明了:课外补习只是作为正规教育的“影子”出现,尚未纳入政府公共管理的范畴。我们担心,一旦课外补习从“影子”走向“光明”,既得利益方就会千方百计去保持它。因此政府应主动作为,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发布年度报告,加强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培育社会理性。

东欧三国中高等教育机构教师从事课外补习的占据了一定比例的事实警示我们,随着大学自主招生考试的进行,名目繁杂的自主招生考试辅导培训班的应运而生,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一部分教师特别是实行自主招生考试的教师将出现在补习教师队伍之中。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滋生教育腐败,影响社会公平。因此如何预防腐败,确保社会公平,无论是对我国还是东欧三国均有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陈全功. 补习教育的地域延展及其社会效应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12, (3): 42-46.
- [2][3] [8][11][12][14][18][19] Iveta Silova, Virginija, Mark Bray (2006) Education in a hidden marketplace :

monitoring of private tutoring –Overview and Country Reports , Budapest: Education Support Program (ESP) of 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

[4][13] 薛海平, 丁小浩. 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研究 [J]. 教育研究, 2009, (1): 39-46.

[5][10] 马克·贝磊. 教育补习与私人教育成本 [M]. 杨慧娟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2, 138.

[6][7] 楚红丽. 我国中小学生课外补习家庭之背景特征及个人因素 [J]. 教育学术月刊. 2009, (12): 22-27.

[9] 马克·贝磊. “影子教育”之全球扩张: 教育公平、质量、发展中的利弊谈 [J]. 比较教育研究, 2012, (2): 13-17.

[15][22] 陈全功, 程蹊, 李忠斌. 我国城乡补习教育发展及其经济成本的调查研究 [J]. 教育与经济, 2011, (2): 32-36.

[16][17] 曾满超, 丁小浩, 沈华. 初中生课外补习城乡差异分析—基于甘肃、湖南和江苏3省的初中生课外补习调查 [J]. 教育与经济, 2010, (2): 7-11.

[20] 山东立法禁止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引争议 [EB/OL]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10/17/content\\_2891521.htm](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10/17/content_2891521.htm).

[21] Bray, M. “The Challenge of Shadow Education, Private Tutoring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Policy Maker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IEP of UNESCO, Jun 2011.

### **Private Tutoring: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re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China** **Yang Hong liang**

**Abstract:**By comparing private tutoring between thre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China,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reasons for private tutoring's rising differ in cultur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but private tutoring results from global educational culture,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social competi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implicit logic of school systems.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class reproduction urge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social welfare. The unofficial nature of the scale data and the non-intervention of policies find it imperative to be reformed by the government. That many college teachers work as part-time tutors in the three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lerts our government to the corruption resulting from independent recruitment of students test.

**Key words:** Private Tutoring ;Three European countries

(上接第20页)

### **Research on American Children's After-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and Its Enlightenment** **SUN Chuanyuan HAN Xiao**

**Abstract:**American children's after-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have their certain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lthough they have already taking shape today, there are also some in surmountable problems in the growing process. We can foresee the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and get more useful enlightenments, such as focusing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families and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so on through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roots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pres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Key Words:** America; after-school education programs; child care; self-care; disadvantaged children